

“新时代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敖 凯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为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精神和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贺信精神,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承办、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中心协办的“新时代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21年9月24—27日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韩国、印度、墨西哥、新加坡、尼日利亚等国的四十余家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就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等相关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研讨。

一、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思考

对于如何开展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所长夏春涛指出,为加快构建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我们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以此作为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思想灵魂和根本遵循;树立正确党史观、历史观,发挥引领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的时代责任与使命;坚持问题导向,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总结历史经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历史智慧和理论支持;强调为人民做学问的学术情怀,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学术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是指导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纲领性文件,内容丰富,常读常新。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田心铭认为,一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第一资源,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另一方面努力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自己的贡献。道路决定命运,旗帜引领方向。江西师范大学张艳国认为,道路与旗帜说到底就是政党与理论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在近代中国社会苦难深重中产生的有初心有使命的政党,它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起来,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虽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在具体目标上各有侧重,但它们是一个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整体。因此,只有深入研究,统筹协调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切实有效地加快构建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宋月红认为,当代中国史学科体系虽已基本确立,但在创新发展研究方面,应加强对正确党史观、中华民族历史观的研究,从历史发展大势、时代潮流和全球视野构建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根据当代中国史的分期理论发展,深

化通史性、时期史研究,构建和推进新时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万明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的建构问题,指出中外关系史学科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学科体系建构中有三大特点:开创性、交叉性、综合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张德明在梳理中国口述历史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就口述历史“三大体系”建设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欧阳哲生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初创迄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它的发展经验及其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值得总结。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王建军考察了清末民初“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史。澳门理工学院林发钦则对百年来澳门史学的发展进行了回顾与省思。

鉴于目前大多数学科的学科体系已基本形成,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在于如何完善,而与之相关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仍集中于对概念内涵和如何建构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比学科体系建设更加艰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武力考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术体系建设问题,认为有三点内容不能忽视: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是我们建立新中国史话语体系的基本史观和方法;二是在新中国史的学术体系建设中,要处理好理论和史料的关系,必须从历史事实出发,不仅要持之有据,而且要论据真实充分;三是学术体系建设要做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

现代学术体系与概念是在西方率先发展起来的,具体内容也是以西方历史经验为基础的。因此,建设中国历史学的话语体系,前提是要解构和突破西方中心论。对此,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顾奎斋认为,只有重新认识中西方历史,才能依据客观历史特别是本土资源解构和突破西方中心论的理论体系,并在国力提升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史学话语体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朱孝远指出,目前西方史学史框架中对世界文明史范式的阐释存在一些不足,中国学者在世界史研究中应凸显中国特色,构建中国的世界史话语体系,从内容上改进世界史教学。针对西方考古学语境中预设的古今一体与世界通则的一致性前提可能带来理论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武钰娟认为,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来重建这种一致性,是解决该问题的关键所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韩东育认为,对于中国共产党100年来的光辉历程和历史成就,对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逻辑在今天的发育和延伸,需要采用长时段的观察才能理解。在中国已经开始以强国姿态出现于世界舞台,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如何能稳步地构建起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必须的“新话语体系”和“新文明体系”。

历史书写的背后,实际反映的是话语体系问题。俄罗斯科学院亚历山大·弗拉德列诺维奇·舒宾(Shubin Alexander Vladlenovich)就1917—1922年俄国革命的内涵、成因,以及不同政治势力的角色和本质进行了分析。厦门大学陈支平以“南岛语族”的起源问题为例,一方面批评“台独”分子和个别不明真相的学者利用学术问题“去中国化”的错误行径,另一方面呼吁历史学者要有主体意识。

历史教材作为历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载体,其内容编排与书写关乎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成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帆认为,当前的高校中国史教材编撰应将编撰思路和模式的多样化作为主要着眼点,注重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注意高校和中学教学培养上的区别和历史内容的选择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李世安认为,在中国世界现代史教材体系建设中,应立足中国新发展阶段的现实,贯彻新发展理念,放眼世界,总结经验教训,发扬成绩,补足短板。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方面,将现代西方的科学方法论引入史学研究,从中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话语和理论,是当代中国历史学建构话语体系的一个重要途径。对此,云南大学发

展研究院李杰在回顾辩证法与复杂性思想关系的基础上,就复杂性思想运用于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另一方面,开展各国历史学建设的比较研究,是构建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不可忽视的一项内容。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安洙英分析了韩国历史学界近五十年历史叙述的发展和变化。印度海德拉巴大学里拉·穆克吉(Rila Mukherjee)认为印度与中国同为发展中国家,两国的历史学学科在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是相近的。面对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印度历史学的学科建设必须加强中等教育建设。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查尔斯·奥努奈居(Charles Onunaiju)介绍了非洲的中国学研究现状和尼日利亚历史学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指出中国历史研究的形态、模式和内容为历史研究建设提供了框架,也是历史和文化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对尼日利亚历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开启和推动了现代中国思想界的根本变革,确立了中国史学的马克思主义方向。忻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程鹏宇考察了传统诸子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下发生的变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史学史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步入新的探索与发展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赵庆云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7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情况,指出此17年的近代史研究构成当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学统,也必定影响近代史学科体系与学术体系的未来走向。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黄令坦认为,毛泽东史学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体系完备,表现了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尊重,体现了中国史学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特质,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史学思想。

近年来,唯物史观指导地位有所弱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吴英指出,我们需要对唯物史观做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重新解释,以保持它对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董欣洁分析了唯物史观的文明话语问题。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冯佳考察了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长时间”及其经济史意涵。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范国强表示,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应坚守唯物史观,坚定史学自信,进一步加强史家主体的行为规范和相关史学素养的提高。美国密苏里大学泰迪·科迪切克(Ted Koditschek)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诸多概念对全球史的发展必不可少,唯物史观在社会史、全球史的发展过程中仍将发挥重要作用,并足以让发端于西方社会史的“自下而上的历史”走向世界舞台。

三、史家研究

史家作为史学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受到研究者关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李长银对郭沫若与古史辨运动的学术关联进行了再探讨,认为郭沫若可被视为“古史辨运动”的一位重要外援参与者。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维佳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吴晗治史的转变,认为这一转变为他日后转向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基础。

当今中国史学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重要历史时期。随着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新锐历史学家的陆续离世,亟需及时总结他们的史学思想。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马敏考察了章开沅史

学思想的特质,将其归纳为四点,即“别识心裁”的史识、“贯穴融铸”的通识、“学者人格”的史德和“因诗悟史”的史感。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徐志民对步平在中日关系史研究方面的成就、理论、方法和特点进行了梳理,认为其中日关系史研究往往是根据中日关系发展变化的需要,从妥善处理中日历史问题和维护中日友好合作的大局出发,站在世界和平与人类友爱的共同价值立场上,以长时段和大历史的学术眼光,打破学科壁垒,实施贯通研究,为中日关系史研究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方法。

四、全球史

在当代国际史学思潮中,全球史(global history)是一个备受瞩目的热点和重点研究领域。全球史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利用广泛的空间视角,关注通过移民、征服、贸易引起的民族、商品、思想跨区域的互动。墨西哥学院卡洛斯·马里查尔(Carlos Marichal)通过对中国与17—18世纪作为国际货币的西班牙银元的考察,认为分析16—19世纪初西班牙银元在美洲、欧洲、中东和亚洲流通的历史和地理轨迹,可以更好地阐明前现代时期全球化进程的诸多重要方面。墨西哥学院马里亚诺·波尼亚利安(Mariano Bonialian)讨论了马尼拉大帆船的意义,认为这些船只不仅刺激了亚洲内部市场的货币化过程,而且使西属美洲的物质文化更加丰富多样,对西属美洲消费者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虽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办会方式,但丝毫没有影响国内外学者研讨的热情和效果。总体而言,本次会议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内容丰富,主题鲜明。本次研讨会虽有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家和全球史的内容,但始终围绕新时代如何加快构建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进行研讨,中外学者各抒己见,群策群力,很有现实性和针对性。二是参会学者广,研讨层次高。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既有中国学者,也有外国学者;既有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家,也有刚出校门的青年学者,还有在读研究生,大家普遍关注新时代中国历史学的“三大体系”建设,关注新时代历史学的发展变化与未来走向。三是关注度高,影响广泛。中国社会科学网、人民政协网、中国历史研究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以及《中国社会科学报》《人民政协报》等纷纷推送报道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特别是历史学界的关注,提升了新时代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作者敖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编辑;邮编:100101)

(责任编辑:张舰戈)

(责任校对:徐志民)